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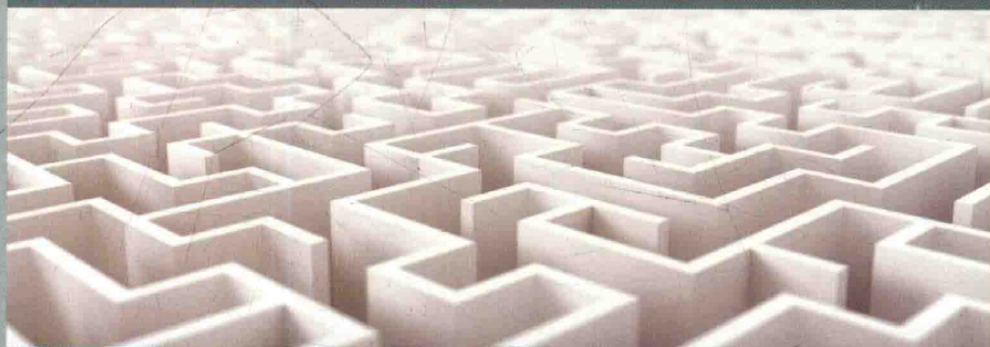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文丛

王 军 主编

哲学实效论与翻译符号学

Pragmaticism and Translation Semiotics



贾洪伟 ●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文丛

哲学实效论与翻译符号学

贾洪伟 著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实效论与翻译符号学 = Pragmaticism and Translation Semiotics / 贾洪伟著. —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9.5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文丛/王军主编)

ISBN 978-7-5672-2659-3

I. ①哲… II. ①贾… III. ①实践论-研究②翻译-符号学-研究 IV. ①B023②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4404 号

书 名: 哲学实效论与翻译符号学
Pragmaticism and Translation Semiotics

著 者: 贾洪伟
责任编辑: 汤定军
策划编辑: 汤定军
装帧设计: 刘 俊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装: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E-mail: tangdingjun@suda.edu.cn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7481020

开 本: 700mm × 1 000mm 1/16 印张: 23 字数: 476 千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659-3

定 价: 7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512-67481020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文丛》

编委会

顾问 胡壮麟

编委会主任 王铭玉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拼音顺序)

丁尔苏 胡壮麟 唐小林

王军 王腊宝 王铭玉

辛斌 熊学亮 杨信彰

张杰 张德禄 赵毅衡

主编 王军

序 一

在国外，有关实效论的思想早在古希腊就有，后经德国哲学家的提炼和发展融入 18 世纪、19 世纪的德国哲学。皮尔士受康德哲学影响，结合符号指称意义有关发现，于 19 世纪末期提出“实用论”（Pragmatism）术语，论述有关思想和内涵。后来，该术语被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用于心理学和伦理学之中，与皮尔士提出实用论的初衷产生了较大偏离，无奈之下，皮尔士提出“实效论”（Pragmaticism）这一新术语，从而产生有关新旧术语及其思想应用的纷争。

在国内，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引入皮尔士实用论与实效论思想至今，学界极少区分这两个术语，且均以“实用主义”这一术语姑且称之。此举不但混淆了两个术语的意义指称，还模糊了二者背后的理论思想和所指内涵，长远来看对哲学实用论、哲学实效论、符号学、语用学乃至语义学和句法学的理论研究颇为不利。贾洪伟博士正是基于厘清概念的初心，开始了原典的研读与阐释工作，将与皮尔士实效论有关的系列论文及其相关的解读和发展文献译为中文，此举无疑起到了为学界解惑答疑的功用，相信会得到同行的应有赞许。

贾洪伟博士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去年，我拜读了他的两部译稿《符号学与翻译问题研究——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和《翻译符号学初探——格雷论文选译》，今天又收到他的第三部书稿《哲学实效论与翻译符号学》。虽然翻译符号学经典作品以及翻译符号学的相关经典文献一直在我们“符号应用与传播中心”事先的学术计划之中，但没想到这么快贾博士就完成了第三部书稿，我甚为欣喜，同时也非常欣赏他这种从不懈怠的学术精神。

贾洪伟博士是一位有品位的学者。皮尔士是享誉世界的伟大哲学家，他兼通逻辑、数学及其他科学，著述等身，被学界评述为难以与其比肩之哲人。在其影响下，美洲一批学者也颇有见树，著述纷纷，为相关领

域研究者所追崇。贾洪伟《哲学实效论与翻译符号学》书稿以皮尔士哲学实效论 (Pragmatism & Pragmaticism) 为主线, 包括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莫里斯、佩尔斯以及美国哲学家杜威的相关作品, 如《澄清概念》《确定信念》《何谓实效论》《实效论辩序言》《实效论诸问题》《人类的镜式本质论》《符号理论基础》《符指过程、符指过程系与符号学》《皮尔士的实效论学说》《实用论的“实际”有何所指》等, 采取先著述后附译文的方式, 承古今, 述往事, 思来者, 明道理, 可谓方式独特。这样一来, 该书不但为国内皮尔士研究、杜威研究、莫里斯研究等提供原始的信息参考, 还为国内西方哲学研究、现代符号学研究、语言学研究、翻译符号学研究乃至翻译学研究提供皮尔士实效论的汉译文献, 从而丰富了国内的皮尔士文献资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人类的镜式本质》《Pragmatism 词条释义》《符指过程、符指过程系与符号学》《符号理论基础》《皮尔士的实效论学说》《实用论的“实际”有何所指》几篇文章均为首次译出, 且作者还深入地分析中外的承袭脉络、理论之利弊, 以当前之知识基础阐述翻译符号学之思想, 故具有较大的参考和实用价值。

贾洪伟博士还是一位富有思想的学者。2015 年前后, 我们共同提出了构建“翻译符号学”的思想主张, 之后他就一直孜孜不倦地思考这门新学科的理论基础问题, 沉浸于“学理构筑”之格局之中。他这部书稿不是简单的翻译, 而是采用述—评—作—译的形式, 并且联系翻译符号学展开思考, 力图呈现哲学实效论思想以及依托于诸篇论作构建的翻译符号学思想。同时, 文稿以译文形式呈现原始经典文献可起到互参互证的作用, 并借重译之机, 达到正本清源、重现经典魅力的目的, 还可为今后翻译符号学、哲学实效论、符号学、语义学、语用学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提供思想依据和文献参考。

愿贾洪伟博士不仅迷恋皮尔士的科学符号学思想, 更要关注翻译符号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的构建与成长, 为其在中国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王铭玉
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

2018 年 5 月 1 日于天津

序 二

我与贾洪伟教授结缘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逻辑学会符号学专业委员会的成员，频繁在各种符号学年会及高层论坛上交流，对他在翻译符号学方面的研究印象深刻，对他的治学态度、学术研究成就非常钦佩。他邀请我为作《哲学实效论与翻译符号学》作序时，我欣然应允，尽管我自己非常清楚，在符号学领域，尤其在翻译符号学领域，他才是名副其实的专家，这一点毋庸置疑。

拿到他书稿的电子文本时，我甚是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一部著述可用这样一种风格来呈现。他自己在后记中写道：“本书先著后译，著为主体，译为附录，著脱胎于译，译附征于著，二者相辅相成，相融于一体。”这种呈现形式虽然可能会抹杀经典名篇的翻译的价值，但融合了作者对于经典名篇有关问题立足于国际视角的本土化思考，似乎对中国翻译符号学研究乃至中国符号学研究来说具有更为宽阔的思考视角和文献参考价值。事实上，这本书所要呈现的有两大板块的内容：一是围绕每篇经典论文中的核心思想做出多视角的评述，从中挖掘翻译符号学方面的重要思想，努力建构和夯实翻译符号学的理论体系；二是附录精心挑选的国际符号学名家关于哲学实效论的论文加以首译或重译。正如本书的结构所呈现的那样，著的内容与翻译文本几乎各占一半，其学术价值也大致平分秋色。

著的内容可谓本书的最大亮点，其作用不仅是对早期哲学实效论的核心思想做出解读，还对其在国内外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学术价值等加以说明与阐发。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以原典为起点，以分析阐述为纽带，最后达到为翻译符号学的理论建构服务的目的。所以，书中每部分本身就是一篇颇有广度和深度的研究论文。

翻译文本的价值体现在论文的选择和翻译质量两个方面。首先，作

者围绕哲学实效论这一主题，按照源流继承与发展的脉络，精心挑选了皮尔士、杜威、莫里斯和佩尔斯的相关论文，在极为宏大的符号学背景下，把关注点聚焦在这些国际顶尖符号学家对哲学实效论的系统而深刻的阐述上，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权威背景资料。其次，在翻译过程中，作者既忠实于原文，更处处为读者着想，如文内提供了大量的译者注，在原文本之外增加了很多便于读者理解的背景信息或解读。仅仅是正文前添加的“译本语言符号使用规范说明”这个贴心而专业的说明，就足以反映出作者优秀的学术素养及对译本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

国外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始于1994年荷兰学者格雷（Dinda L. Gorlee）的专著《符号学与翻译问题：译皮尔士符号学为纲》，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则稍为滞后。通过使用中国知网（CNKI）加以检索（检索时间为2018年11月26日晚），我发现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数据：在使用关键词“翻译”并含“符号”精确检索时，共找到193篇论文，时间跨度为1963—2018年，在这56年的漫长时间里，如此数量的论文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当使用“翻译符号学”作为“篇名”检索时，却只找到21篇论文，时间跨度也只有4年（2015—2018），也就是说，在2015年以前，没有一篇论文的标题中出现过“翻译符号学”的字样。在这21篇论文中，除了3篇刊登在国际知名符号学期刊 *Semiotica* 上以外，有11篇为核心期刊论文，作者分别是王铭玉（3篇）、贾洪伟（3篇）、吕红周（3篇）、潘琳琳（2篇）。最早的一篇核刊论文是王铭玉教授于2015年在《中国外语》上发表的《翻译符号学刍议》，紧接着贾洪伟于2016年在《外语教学》上发表了《翻译符号学的概念》一文，这两篇核刊论文可以看作吹响了国内翻译符号学研究的号角，起到了很好的普及翻译符号学基本知识的作用。通过上述简单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国内学者关注符号与翻译之间关系的时间比较早，但一直未把翻译符号学的建设提上议事日程，直到2015年王铭玉教授的论文的发表，这一状况才开始改变。但即便如此，不但重要的研究成果数量依然有限，而且相关学者主要是王铭玉、贾洪伟、吕红周和潘琳琳这四位学者。据我所知，他们四人都活跃在京津两个城市，不但彼此熟悉，而且学术交往甚密，这对于翻译符号学思想的发展与传播算是一大幸事，但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学者、更多的大学及研究机构能够加入推动翻译符号学发展的潮流中来。

方梦之教授（2015）曾把翻译活动分成基础层次的翻译实践和较高

层次的微观（指翻译技巧）、中观（指翻译策略、模式、纲要）与宏观（指翻译原理）翻译理论研究。按照这个分类方式，翻译符号学研究应该属于较为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关注的是翻译活动的本体论、价值观、方法论、认识论以及范畴体系等处于较高层面或较抽象层面的基本理论问题，触及翻译符号研究的哲学层面，关注的是翻译符号研究的“普世价值”。如果拿语言学做比喻的话，翻译符号学大致相当于语言哲学，比抽象的、理想化的形式语言学要高一级，更不同于关注现实语言的功能语言学。如果拿认知语言学做比喻的话，翻译符号学则基本相当于体验哲学（embodied philosophy），正是得益于体验哲学这一宏观的指导思想，认知语言学的研究领域才得以不断拓展，人们对语言与思维之间关系的认识才得以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本书的出版，随着翻译符号学的思想越来越广为人知，一定会带来翻译理论研究以及翻译实践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王 军

写于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崇远楼

前 言

在“前言”里，我想有必要交代为何选择皮尔士为切入点。有关这一“谜团”，我觉得可以从国际学界对皮尔士的学术评价和我个人的兴趣两方面做出解答。有关皮尔士的学术评价，国际学界虽然各有看法，但总体来说还是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马克思·菲什（Max H. Fisch）在西比奥克（Thomas A. Sebeok, 1920 - 2001）写作的《冥思活动》（*The Play of Musemen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一书中对皮尔士做出的评价不但公允且比较全面，更引发国际学界的共鸣，故仅以菲什的评价为依据，引述学界对皮尔士的学术品评，即“纵观美洲学界，谁人堪称最有建树、最为多产的学者？若推举皮尔士，便是无可争议的。舍此一人，此后无人敢居此位。数学、天文、化学、测量、勘测、制图、计量、波谱、工程、发明、心理、语文、词典、历史、数理经济、医学、评论、戏剧、演出、小说、现象、符号、逻辑、修辞、形而上学，他无学不通。仅举数例以说明之。皮氏乃美洲近代实验心理学之先锋人物，乃率先采用光谱波长为测量单位的天文学者，乃球体梅花状投射仪发明人，乃构想电子开关电路计算机设计与理论的先锋人物，乃‘研究经济’理论之父。他是美洲唯一构建哲学系统的学者，不但兼通逻辑、数学及其他科学，还著述等身。如果哲学史上有任何与他比肩

之人，也绝不超过两人。”^①

我个人的兴趣点也掺杂着学术的考量。首先，皮尔士的符号学是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三元哲学，可为翻译符号学打破以往以二元哲学观为基础建构的符号学、翻译学、哲学、语言学等学术视角，可以更为宽广的视角看待广义界定的翻译过程以及翻译过程中的阐释问题；其次，为以二元哲学（尤其是以索绪尔二元符号观）为基础建构的符号学、翻译学、语言学提供另一个观察侧面，打破固有二元哲学主导的学术传统，丰富翻译学、语言学、符号学的内容，以图能够更为合理而充分地观察、描写、分析和解释符号转换的过程以及符号转换过程中出现的阐释问题，进而看清翻译过程、翻译行为、译本之符号学本质以及作者、译者、读者之符号学关系；最后，我觉得皮尔士的哲学思想与我个人的哲学理念具有颇多的契合之处，自己十分迷恋皮尔士的科学符号学思想。在阅读文献过程中，我发现有关实用论（Pragmatism）与实效论（Pragmaticism）之间的认同问题自这两个术语创生之日就已有之，理论评论家对两个术语的混淆以及以 Pragmatism 这一术语所包含的理论变体的纷繁复杂问题，始终引发学界的关注，因此梳理这两个术语的缘起与发展、界定二者的边界就尤其重要。故而，我才着手研读和翻译皮尔士的经典符号学作品，并将皮尔士的哲学思想应用于翻译符号学有关翻译过程、翻译现象、翻译行为的解释和分析。之所以会如此，恐怕不得不提皮尔士三元符号观与翻译联姻的一系列具有“蝴蝶效应”的标志性学术事件。1959年，布拉格语言学家雅可布森受皮尔士哲学观影响，在二元哲学为主导的框架内构建了“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三种译域类型，虽然

① 原文如下：Who is the most original and the most versatile intellect that the Americas have so far produced? The answer “Charles S. Peirce” is uncontested, because any second would be so far behind as not to be worth nominating. Mathematician, astronomer, chemist, geodesist, surveyor, cartographer, metrologist, spectroscopist, engineer, inventor; psychologist, philologist, lexicographer, historian of science, mathematical economist, lifelong student of medicine; book reviewer, dramatist, actor, short story writer; phenomenologist, semiotician, logician, rhetorician and metaphysician. He was, for a few examples, the first modern 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 in the Americas, the first metrologist to use a wavelength of light as a unit of measure, the inventor of the quincuncial projection of the sphere, the first known conceiver of the design and theory of an electric switching-circuit computer, and the founder of “the economy of research”. He is the only system-building philosopher in the Americas who has been both competent and productive in logic, in mathematics, and in a wide range of sciences. If he has had any equals in that respect in the entire history of philosophy, they do not number more than two. (<http://www.peirce.org/life.html>, 2017-04-22)

这一三分法不甚完美^①，但对此前的翻译类型研究而言确是一种不小的进步。1993年，荷兰学者格雷（Dinda L. Gorlée, 1943 - ）以博士论文《符号学与翻译问题——以皮尔士符号学为纲》获得博士学位，次年出版同题专著，堪称是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里程碑式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的符号学翻译、翻译符号学的学术争鸣。

尽管如此，我与王铭玉教授提出的“翻译符号学”尽管英文术语也叫 Translation Semiotics，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格雷、特洛普等国外学者的研究^②。首先，国外学者或是以翻译问题佐证与诠释皮尔士符号学理论，如格雷的一系列文章，参见《翻译符号学初探——格雷论文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有关格雷作品的相关评论，或是以文化为本领域学术讨论的根本，如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作品，虽然特洛普有心如我们这般建构翻译符号学的框架，厘定翻译符号学的所指边界，但均囿于文化符号学或文化的范畴之内。其次，国外学者虽然也明确了翻译符号学侧重过程和阐释两个层面，但没有及时地在符号学范畴下界定翻译的所指范畴，或是局限于索绪尔的二元哲学，或是局限于皮尔士的三元哲学，抑或是局限于以文化为基础的一元哲学，不似我们这般主张以三元哲学为主导的多元互补观，这也是翻译作为符号转换问题之本质所决定的，没有将符指过程外部所涉及的主客观因素纳入翻译符号学的研究框架。最后，以国外学者为参照，我们先明确翻译符号学属于以广义所指翻译为参考的符号学研究，确立翻译符号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和方法论，界定翻译符号学的相关术语，勾勒翻译符号学的框架，设立翻译符号学的理论和应用任务。

有关符号与符号转换问题的相关思考

尽管对翻译的界定，学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有关符号和符号的转换问题，符号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却早有论述。简单地说，符

^① 有关雅可布森翻译三分法的批判式分析，参见：贾洪伟. 雅可布森三重译域之翻译符号学剖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6年第5期; Jia, Hongwei. Roman Jakobson's Triadic Division of Translation Revisited.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2017, No. 1.

^② 参见：贾洪伟. 翻译符号学的概念[J]. 外语教学, 2016年第1期; 贾洪伟.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J]. 山东外语教学, 2016年第3期; 贾洪伟. 间隙弥合——古希腊经典翻译之符号学解读[J]. 外文研究, 2017年第1期; 贾洪伟.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的符号分类与转换[J]. 山东外语教学, 2018年第1期。

号是什么？符号就是人类依据自身表情达意之需求而创立的表意系统，又根据符号表意的现实需要制定了符指规范。故而，符号乃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之结晶，同时也是人类智慧的体现；符号组合更是人类根据自身创造符号和使用符号表意的智能性设计，这两点基本上是毋庸置疑的。

可是，赵彦春在题为“语言的修养与翻译的质量”（2016年12月2日在北京工商大学）的学术讲座^①中有如下观点：“意义产生的效用便是功能效用。符号的组合是一种超出经验的智能设计，译者需要具有形而上思维方能洞穿语言的组合之妙并在译语中恰当（地）转换。”进而，根据其翻译经验，赵彦春提出了一个具有浓厚符号学或翻译符号学色彩的公式： $\text{translation} = \text{transformation} + \text{transmigration}$ 。坦白地讲，从符号学学理看，这段引文中有关符号组合的阐述以及翻译公式的构成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如前所述，符号乃人类社会生产创造之经验与智慧的结晶，旨在用于人类社会生产中表情达意之用，这在马克思有关人类语言与社会生产之间关系的阐述中可寻到依据。故而，“符号的组合是一种超出经验的智能设计”一说十分不严密，也不符合人类创生和使用符号的事实。试问：（1）如果人类不依凭自身的需要和使用身边器物作为表意符号这一经验，如何能造出超出自身经验的智能组合？难道是符号创生的神话论观点？！（2）人类之智能难道不是源自人类千百年或万千年的社会生产经验之积累与证实吗？（3）符号组合如果不是人类社会生产积累的经验所形成的智能成果，那又是什么？（4）如果符号组合的确是人类社会生产经验形成的智能化结晶，符号组合又怎会超出人类之符指经验？有关符号生成和使用问题，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就提出本能—经验—习惯（*instinct-experience-habit*）这一三元项。其中，“本能”蕴含的是抓捕信息以及用符号表达信息的“智能”；“经验”涵盖符号组合和符号使用过程中的确定性规律，应受人类智能的制约，即智能是水、经验是船，二者是水涨船高的关系；“习惯”就是符号之从无到有、从有到使用的物质形态。单语范畴内的符号使用较为单纯，三者的关系为本能的抓捕信息，凭借经验选择符号加以组合，最终落实到物质形态；双语范畴内的符号转换为略微复杂，三者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一定的变化，即目标读者（可能是

^① 参见“语言与翻译”微信公众号于2016年12月6日推送的“CCTV 央视直通车：语言的修养与翻译的质量——北京工商大学讲座”。

母语者，也可能是目的语者，更可能是作者自己）凭借信息读取和抓捕这一本能，参考第一语言的使用特点以及第二语言的表述规律，通过无形符号之中介语运动，将所抓捕的信息经中介语阐释后，找到动态符号对象和终端解释项，以作为目的语的第二语言表达出来。譬如，在《东西方合集》中，歌德保留哈菲兹、国王、公主等东方文化的异质性称谓与行为符号，特别是以自己的情人维勒美尔（Marianne von Willemer, 1784-1860）替换东方文化域中的女诗人苏莱卡（Nicoletti, 2002: 349-376）。歌德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翻译观（即让文本走向读者）且身体力行，是因为通晓多门语言的歌德使用语言符号的本能（instinct），加之他的翻译意图和符号阐释与转换经验（experience），促使他最终形成了逐行翻译式的语言符号结构和表达模式对等现象。

有关 translation = transformation + transmigration 的公式问题，笔者跟讲者求解，达到的答复为：“这涉及翻译的整个过程，是一个机遇可拓逻辑的制衡和否决机制。”根据赵氏的答复可以推知：公式中的 translation 当为广义翻译解，应该包括所有的符号转换类型，但他所举的例证就只有老子《道德经》和赵元任《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语际翻译，说明赵氏的“翻译”并非是囊括所有符号类型的转换行为或文本。究其原因，极有可能是赵氏没有从符号学角度去理解这三个术语。那么，在符号学或翻译符号学中，这三个术语到底如何界定呢？

首先，自公元前 300 年左右，一旦言及翻译，言者必然涉及两门语言或语言与方言之间的转换问题，可以佛经翻译和《越人歌》的翻译为佐证，无视当时业已存在的有形符号向无形符号以及有形符号（人体）向有形符号（雕像）的转换现象。现如今，翻译学已经位列现代科学的学科阵营，不能如从前一般无视有形符号与有形符号、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现象了。^①从广义翻译和符号定义的角度讲，翻译范畴之核心乃是语言与语言之间的转换，既包括一门语言与另一门语言之间的转换，也包括一门语言与一门方言之间的转换；其边缘成员则为一门语言之古今形式、雅俗形式、体裁形式等之间的转换，以及一种类型符号

① 有关有形符号与有形符号、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分类以及界定问题，参见：贾洪伟. 翻译符号学的概念. 外语教学, 2016 年第 1 期；贾洪伟.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 山东外语教学, 2016 年第 2 期；Jia, Hongwei. Reclassification of Sig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Chinese Semiotic Studies*, 2018, No. 2；贾洪伟. 论翻译符号学的符号分类与转换. 山东外语教学, 2018 年第 1 期。

与另一种类型符号之间的转换，如思维到文字、交通信号灯之颜色到行为指令等。若如此界定，翻译概念所指之范围势必要有所延展，翻译学之历史势必要有所延长。

其次，关于 transformation 的界定，Mark Shuttleworth & Moira Cowie 合编的《翻译学词典》（*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第 179 页认为，transformation 等同于“结构重组”（restructuring）。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第 4 页指出，“（转换）源自语言学，指按照一定的规则，用重新安排结构成分的次序、添加或省略某些成分等手段，把一个或几个语言结构改变成另一个语言结构的过程或结果……语言学中的转换是指同一语言内部的结构转换；翻译研究中的转换是指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显然，尽管二者虽然措辞不同、详略有异，但均囿于结构主义的二元观论点，以原文本为参照，以译文本为终端的观点，透露出浓厚的对等论色彩，且将翻译范畴所指做简单化处理。

相比之下，A. J. Greimas & J. Courtés 合编的《符号学与语言——一部分分析字典》（*Semiotics and Language: An Analytical Dictionar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第 348—350 页列出 6 种定义（择精要译出如下）：

（1）概言之，符号转换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符号对象之间的关联（或曰关联关系之建立），如语句、篇章碎片、篇章、符号系统等，欧洲学界指的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美国学界则指的是数学尤其是符号学中形成的逻辑程序，故而经常出现混淆和误解。

（2）从应用视角看，抛却内在本质不谈，符号转换可分为文本间性转换（intertextual transformations，即两个和两个以上独立符号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是组合关系，也可以是聚合关系）和文本内部转换（intratextual transformations），后者又次分为深层符号结构层面的转换和符号对象深层和表层之间的转换。

（3）在众多的文本间性转换中，苏联的波普转换（Proppian transformations）尤为重要。波氏先描写了苏联民间传说的“形态”，再尝试将其叙述模式置入历史的维度，试图辨识该模式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转换形式，但波氏以 19 世纪语言比较为参考点，忘却了民间故事中的传奇乃理性的，且不符合科学逻辑规律，故而存在诸多瑕疵。

（4）发展于列维·斯特劳斯的转换概念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因应用于复杂且多样性的语言现象之中，就无法保持精确度和同质性，故

而从语言历史比较着眼，将其特征分为如下三端：斯特劳斯厘定之神话既非理想形式也非诸多变体之历史逻辑原型，仅是包含诸多神话变体的转换结构或形式关联结构，如弗洛伊德对《奥狄浦斯》的阐释就是该神话的变体，该变体与诸多变体之间乃符号转换关系；有鉴于此，各神话之间也保持着转换关系，旨在构建相互关联的“神话系统”，如有关火之起源的神话被转换为水之起源神话；神话转换并非局部或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即一项制约着局部文本的转换在具体条件下就会滋生另一文本局部的关联变化。

(5) 在叙述符号学范畴内，转换具有文本内部和聚合关系属性，这是对斯特劳斯转换观的一种补充，因为斯特劳斯的转换观具有文本间性和组合关系属性。一旦立足于深层符号结构，转换行为就会被视为逻辑运算。在逻辑语义平面，转换被视为一个符号平面的术语转向另一个符号平面的术语，贯穿整个肯定与否定命题的运算。在叙述层面，转换接近于表层结构，对应的是存在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结合与分离。

(6) 在类型学框架内，转换属于生成语法范畴。抛却转换或多或少之形式特征，只从概念理论角度讲，转换乃是文本内部之纵向聚合（即从深层到表层）和组合（语句和横向组合）关系。作为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的一种转换，所遵循的是重写规则，受制于聚合规则，贯穿于聚合规则产生的词串之中。

如上所述，格雷马斯等人的6种定义均囿于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范畴，并未从皮尔士三元论角度思考符号转换问题。从三元符号论角度讲，transformation指的是符号—对象—解释项之间的三元符指关系，即原文本符号—思维中介语文本符号—目的语文本符号，其中又蕴含着像似—指示—象征符号、直接对象—动态对象、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终端解释项三大类符号之间转换的符指关系。这些关系又依据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之间的动态形式参数加以考虑，而并非是单纯地涉及作者—译者、原作—译作、形式—内容、形似—神似、对等与不对等、忠实与不忠实等静态的二元关系。

再次，传统翻译研究多集中在文学翻译，甚至存在以文学翻译取代翻译研究的现象，可事实上文学翻译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下类，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局部而已。前文提及的 transmigration（轮回转世）就是传统翻译研究的一个术语，更具体一点说是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术语，

主张文学翻译（语际翻译）要能够再现文学文本的神韵和文学之美，文学翻译理论家通常号召译者要“再起炉灶，借体还魂”，这是较为典型的“作者之死”“原作轮回转世”等的翻译观。如果可以换一个视角看待这一观点，就不难发现这一“轮回转世”观点之谬误所在。从翻译符号学视角看，翻译乃跨越（有形与无形）符码的符指行为或结果。因翻译是符指行为或结果，符指又是无限的符号阐释与意义呈现行为或过程，总是在两个文本之间的符号—对象—解释项之间徘徊往复，从一个终端解释项到符号—对象—解释项，循环往复，永无终止，故而任何一个终端解释项文本都是暂时性（ephemeral）文本，恰好印证了“一百个人就有一百朵玫瑰”“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说法。“轮回转世”乃原文本之回魂，蕴含的是前世与后世之间只存在时空间性，因为魂灵还是那个魂灵，故而不存在主体间性。可是，翻译范畴中的文本符号转换并非是作者与文本之间的单一性符指行为，还涉及作为读者又作为译者的他者，且在转换过程中还有可能融入来自他者的文化和言语惯例成分（阐释），故而二文本之间会出现主体间性促生的文本间性。因此，从符号学角度也好，从翻译符号学角度也罢，译者所追求的“借体还魂”“轮回转世”是不可触及的“幻术”，只能作为一种理想或曰符号转换之乌托邦而存在。

综上所述，因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和 transmigration 三术语未加界定，又将 transformation 做静态的结构主义形式对应性考察，把 transmigration 做虚无缥缈的精神对应，不适合非文学文本转换之操作，故 translation = transformation + transmigration 这一命题不为真，这一等式不能成立。其实，只要将目光放宽一点，就会发现有关广义符号转换的术语还有 transference, transmission, transfiguration, translocation, metacreation 等，这些术语在涉及符号转换的符号学或翻译符号学的论著中均普遍存在。如果非得要弄一个等式出来，又要是真命题，恐怕只能是：

- (1) translation process = semiosis of linguistic and/or non-linguistic signs^①,
- (2) translation = semiotic text of linguistic and/or non-linguistic signs。

① 此处的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转换包括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所有转换。另外，韦尔比夫人（Victoria Alexandrina Maria Louisa, Lady Welby, 1837-1912）在1902年为鲍德温主编的《心理学与哲学词典》写作的“翻译”词条中就包括 transference, transformation, transmutation, transfiguration 等下义项术语。